大學 周刊

中国科学报

2012年10月24日

周三出版

【主编视点】

从“唯学历论”到“唯能力论”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应届博士毕业生在论坛发帖，他寒窗苦读20余年戴上博士帽，却因本科“出身”非“211工程”、“985工程”高校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一时引发大讨论。

其实，国内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所要求的“第一学历”已经有多年了。所谓“第一学历”，就是参加高考所进入的本科院校。对“第一学历”的要求，最先是从高校教师的录用开始的，很快发展到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等领域，并有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唯学历论”在近些年来愈演愈烈。

然而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没有学历的人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甚至直接考取科研人员的职位，也有直接被聘任为大学教师的，我们可称为“唯能力论”。在早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掌校时，聘请24岁中学毕业的梁漱溟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聘任26岁中学肄业的刘半农为北大教授。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被传为佳话，而支撑这些佳话的背后，就是开放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社会环境。

当然，社会上对于学历要求，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而对于“第一学历”的要求，首先是出于对高考的公平性的认同，其次是本科教育的重要性。上个世纪末，大学大规模扩招以来，教育质量有所下降，用人单位基于对招聘来的员工有质量要求，而考查“第一学历”便由此而生。

很明显，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就业的公平来说，“唯学历论”都不如“唯能力论”。但是孤立地讨论这个现象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根本上研究其形成的原因，从社会的层面上着手改革。

校长面对面

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军：

军民融合实现军队大学的开放性

■本报记者 钟华

31岁担任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银河-3”的总设计师，48岁任国防科技大学的校长，坐在记者面前的杨学军，有着军人的坚毅与干练的气质，而言谈之中，又让人感受到儒雅睿智的学者风度。

1984年成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此后的28年里，杨学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当向记者如数家珍地讲起国防科大的历史与现状、谈到对国防科大未来的思考时，他的语气里蕴涵着对这所学校深深的热爱与自豪。

国防科大是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

坐落在星城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却有着来自北方的血脉——前身是1953年创建于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它既是直属于中央军委的综合类高等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教育部“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这所定位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军队院校，在近60年的岁月里，也为地方培养了无数人才。

用杨学军的话来说就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国防科大是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是我军最高科学与工程技术学府。”事实上，国防科技大学的发展目标正是办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这种独一无二的办学理念，在建校之初就被确定下来了。1978年重新组建国防科大的时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4次来到国防科大，他给国防科大指定了一个“按学科设系、理工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办学思路。

与一般军队院校按军兵种来设系不同，国防科大是按学科来设系的。这样学科设置的模式就能与国际接轨、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接轨，通过办全世界通用的学科，来支撑我国军用特殊人才的需求。据说，当年钱学森讲：“你们既不是MIT，也不是CFT，也不是清华、北大，也不是中国科技大学，你们就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要为国防尖端技术服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坚持了学科建设的理念，通过学科来支撑我军以及国防战线上所需要的人才。”杨学军说，“同时，国防科大是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的院校，也是全军唯一一所进入‘985工程’建设行列的大学。这也要求国防科大要走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路子。”

没有开放性的大学必然没有长远出路

今年2月，杨学军代表国防科大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量子技术与应用研究”的校际合作协议。

3月，杨学军又率团代表国防科大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分别签署了校际联合培养人才协定。

到目前为止，国防科大除了与国内多所高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外，还与韩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余所知名高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

> “大学是传播知识、存储知识、创造知识的地方。如果一所大学传播的是一种封闭的知识和文化，那么这所大学的出路肯定不会长远。只有开放的知识和文化才有生命力。



在杨学军看来，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开放性，出路不会长远。“从大学的本源来说，大学是传播知识、存储知识、创造知识的地方。知识和文化是没有边界的，封闭的知识和文化就是死的知识和文化。如果一所大学传播的是一种封闭的知识和文化，那么这所大学的出路肯定不会长远。只有开放的知识和文化才有生命力。大学要不断地向外部输出自己创造的知识，从外部获取人类新创造的知识，同时也要实现自身文化和外部文化的不断融合和碰撞，才能提升一个新的水平。”

在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中国高校要走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种内涵式发展道路包含了很多要素，其中要素之一就是开放办学。如果关门办学我们肯定达不到世界一流，军队高校也是如此。”杨学军说。

对于地方性大学来说，走开放办学的道路似乎并不困难。然而，对于一所承担了国家军事人才培养、国防关键技术研究等重任的军队院校来说，如何处理开放办学与军用技术保密的关系呢？

“的确，在开放办学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军用的保密和技术的开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杨学军说，“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分为应用和基础两大部分。从基础这部分来看，全世界都是通用的。只要能很好地把这两方面划分开，就能处理好开放办学和技术保密之间的关系。比如像基础学科中的数学、物理学科，比如说很多军民两用的技术，像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我们已经从这种开门办学的思路、军民融合的路子中收到很大的效益。因此，我们认为国防科大一定要走开放办学、军民融合的路子。”

用全世界的师资队伍来培养我们的人才

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对于军队院校更是如此。以教师队伍来说，国防科大的教师队伍都是定编的，编制员额是定死的。“编制定额是符合军队院校特点的，但是仅靠这么有限的资源，很难发展新的学科方向，很难拓展新的应用领域。”杨学军说，所以，国防科大要利用全社会、全人类的师资队伍，按照“不为所有，但为所用”这么一种思路，吸收全世界的优势资源来培养我们的人才。

2006年以来，国防科大先后聘请了13位院士、几十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学校的特聘教授，在学校承担课题研究、培养人才的任务。除了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以外，国防科大还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985工程”一流大学建立人才引进合作机制，先后三批次引进了25名优秀博士毕业生补充教员队伍。

这种对全社会、全世界优秀资源的利用不仅体现在引进人才方面，国防科大在具体的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等方面，也广泛地吸取了地方高校乃至国际一流大学办学的经验。

“我们参考像国内的清华、北大，像国外的哈佛、剑桥、牛津的课程设置。而同时，我们对国防科大课程体系的思考也不断地通过参加军区、教育部和国际的研讨会，向地方大学、国外大学去。这样，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国际大学是融为一体的，形成了既向他们看齐、同时又具备军队特色的一种课程体系。”杨学军介绍说。

在国防科大有一项规定，不管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考试试卷，都要请国内同类高校同专业的教师进行试卷评估。而研究生答辩时，也坚持邀请军队和地方的教师同时参加。另外，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可以选择定期或不定期到国内地方高校和地方的研究所去学习。甚至，有的博士生在校期间3年或4年都可以待在国内其他研究所或者大学作研究。

“通过聚集全社会的力量乃至全球的资源来办这所学校，这是我们的一种思考和探索。我们在地方大学的教学科研改革中吸收了许多经验，广泛采用这种军民融合的方式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应该说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收益很大。”杨学军说。

送出去，也相信他们会回来

今年6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ISC12全球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中，来自国防科大的几位学生获得了最高计算性能奖。走出国门，参加机器人足球世界杯比赛、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等等，对于国防科大的学子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引进国内外优秀师资的同时，国防科大也对教员、学生进行开放式培养，与牛津、剑桥等一批海外名校建立留学基地，遴选优秀青年骨干教员出国留学，为他们构建国际化培养平台。自2007年以来国防科大有300余名骨干教员出国留学或做访问学者，400多名研究生赴英、法、澳等24个国家攻读博士学位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学科学术带头人具有出国留学经历比例达到90%，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后备人才。

在人才外流现象还十分严重的今天，国防科大把学生送出去，是否也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呢？

杨学军对此却很有自信：“把学生送出去是冒风险的，但是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过程中，我们中国无论在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应该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坚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个炎黄子孙都有深深的爱国情结，他们会回来的。通过这些年的实践，2000年以后，我们派出的学生和访问学者100%都回来了。”

事实上，让杨学军信心十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防科大能为他们提供成就事业、施展才华的舞台，“按照军民融合的战略构思，国家和军队对国防科大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提出了非常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为每个国防科大的教职员工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应该说知己首先是国家，国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事业的舞台，那么知识分子都应该为事业而持续不断地奋斗，应该可以为事业而死生。”说到这里，他的眉宇间又透露出那种军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

一段新百年人文发展的“开幕词”

■本报记者 陈彬

漫步于清华校园，穿过标志性建筑——清华“二校门”，在一片草坪的对面，便是每个清华学子都熟知的大礼堂。礼堂建于1917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远远看去，这座罗马式和希腊式的混合古典建筑，在朴素中浸透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这座浸透了人文气息的礼堂建成后不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此后的百年间，清华的人文学科几经沉浮，却一直在顽强地发展，而不久前，又发生了一件足以记载在清华人文学科发展史册中的事件：就在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礼堂里，崭新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正式宣告成立。

百年人文发展路

提起清华的人文学科教育，很多人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一长串鸿学大儒的名字：陈寅恪、王国维、钱鍾书、吴晗……这些大家的思想和著作，也陪伴着清华的人文学科教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

据了解，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成立于1925年。三年后，清华文学院成立，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批学术名家先后会聚清华园，以“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理念和方法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风，在我国近代学术和教育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学院、法学院被调出。“文革”结束后，清华重新开启了文科建设，并于1993年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过复建以来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清华也开始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今年7月，清华决定撤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的人文学科曾为清华赢得无数崇高荣誉，亦是百年清华最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新百年起步时刻，清华终于成就其宏伟的文科复建大业，人文学院的成立堪称这一重要历程的标志性事件，也是表达清华新百年人文发展志向的开幕词。”在成立仪式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如是说。

人文学科需要宽松学术氛围

如果将新成立的人文学院比作一段“开幕词”的话，那么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无疑是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在讲话中，对于为何要“写”这样一篇“开幕词”，陈吉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转型对人文复兴、文化繁荣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重大的契机。”陈吉宁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决定进一步加强文科建设，而考虑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点，遂作出了单独成立人文学院的决定。

而对于人文学院下一步的发展，陈吉宁同样有一番设想与要求。

“人文学院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他说，教师在人文学科的作用尤为明显，希望学院下功夫建设一支少而精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同时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引导教师投身人才培养、潜心学术。“要耐得住寂寞，肯下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

其次，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陈吉宁表示，清华有着优质的生源，这是优势也是挑战，如何将这些好学生培养成为优秀学生是学校长期面临的任务。“希望学院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立人格，立足实际，彰显特色，努力为国家和社会造就未来的人文大师。”

除此之外，陈吉宁还要求学院充分利用学校综合性学科的布局为人文学科发展提供广阔的合作平台，与其他学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彼此欣赏，相互借鉴，为文科发展迈上新的台阶而合力奋斗。

创新重要，传承更重要

2011年，在清华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用到的一个词引起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的强烈共鸣。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文化传承创新’，这让我印象深刻。”在成立仪式的致辞中，甘阳表示，很多年来，大家都在讲文化的创新，但很少有人提及文化的传承，这就导致很多偏差出现。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甘阳说，自然科学是一门“向前看”的学科，需要追求学科的最前沿；社会科学则要“活在当下”，研究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但人文学科则要不断地回到源头。“因此，人文学院对于一所大学，甚至一个社会最大的作用便是加强历史的厚度，这也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特点。”

在甘阳看来，清华人文学院的成立，并不仅仅是在清华原有的众多院系中再多加一个院系，而是表明“清华准备同时高举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这两杆大旗，在全国理工科领域领军的大学当中，特别强调人文科学的发扬”。

然而，要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却也并不容易。

“我特别希望各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目前理工科出身并占绝大部分的大学校长群体，能够对人文学科的特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人文学科当然需要创新，但首先需要的是传承。”甘阳说。

中国大学评论

从诺奖看奖项的提名与申报

■尤小立

当下中国是不宜过多地举办各类评奖活动的。因为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本身就比较突出，评一次奖就可能多出一项问题，日积月累，积劳成疾；与其这样，不如减少评奖频率和次数，顺其自然，让时间做主，看哪一项科研成果能够不朽。近些天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消息，引发了国人的讨论，笔者也不能免俗，又一次想象哪一天中国的评奖活动也能公正和权威。

诺贝尔奖是世界影响最大、争议最少、最权威的评奖，这一点怕是没人异议。从1901年算起到今年已有111年（中间因战争有过中断）。正如伟人所言，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111岁的诺贝尔奖，为全世界做了差不多一辈子好事，让人钦佩的同时，也免不了要问它何以有此耐久力，可以马拉松，到现在，还很可能会跑到永远。

说起来，任何信誉度高的评奖，其评奖原则、条件和程序都不复杂，诺贝尔奖评审也一样。他们只是做到了我们天天讲的“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而已。比如我们以前常常说的为人类进步而奋斗，有人也会说，只是意思稍稍有别——大意是，凡取得对人类发展有持续贡献的成就的人都有希望获奖。结果是我们天天想着“大国崛起”，他们却践行着“人类发展”。因此我们只能产生争议颇多的茅盾文学奖，他们造就的却是持续影响人类发展的原创成果。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真正实施起来，秩序是颠倒的。因为三项里面，只有“公开”一项可以实施，另两项只是实施前的原则或实施后的效果。然而公正、公平直接影响着实施者的态度，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收到要求参评诺奖的某中国作者的信件和有关奖金的许诺后，受宠若惊，因为他以前很少遇此殊荣。诺贝尔奖评委常常自视为普通人，至少内心里没有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可以享受“赢者通吃”的待遇，所以不习惯受人追捧。这也许给我们一点启发：公正首先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因为秉持了平等的态度，所以诺贝尔奖不需要个人申报，也因为不需要申报，所以也就没那么多向组织靠拢的企图。我们从电视上看见，大多数诺奖得主事先都不知道自己得奖。因为时差的关系，甚至有获奖者是在睡眼惺忪中得到通知和接受人们的祝福的。不像我们的主动申奖人，在公布获奖名单的若干天前就要靠吃药辅助睡眠，那些天的电话费也猛增——好在可以在课题经费中报销。据说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的法籍科学家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其获奖消息时，正在中国度假，当时，他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欲望似乎胜过获奖。这是人家的洒脱。

按照我们的理解，诺奖获得者的洒脱，在态度上就是不端正。所以我们的评奖活动永远是要求个人申报。个人申报看上去是尊重个人选择，实际的效果却可能诱发个人的名利观念。因为一旦申报，填表、复印成果、交评审费，折腾再三，就不可能等闲视之。这在我们看来，才是态度端正的表现。

既然是个人主动申报，申报人就不可能满足于被动承受，这关乎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创造力。“化悲痛为力量”是精神性的，“化主动为更主动”则是现实的生存技巧。院士申报人为自己做广告无意中创出了“世界之最”，这是不谙世事的愚昧，却有文明者早已暗渡陈仓，私下里打通各种关节。

对于我们的一些评委，评奖就等于是分配大饼，你的人，我的人，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饼先满足我们的人的要求顺理成章。这里面有感情的交流、利益的交换，既符合人情大国的传统，又符合现代市场的规律。对于一般申报人，申报奖项基本上等于买股票，申报费交上去，汇总、提成、再分配，涨还是跌就不是你能够控制的，结果少数得奖人赢得了大家的申报费，形成了个人与组织的双赢，回到自己工作的单位还会有“三赢”。这是政治兼顾经济，或可说是现实版的“政治经济学”。

申报人主动出击，为自己的成果吆喝，当然意识到评奖场成了菜市场，但既来之，则吆之，不遵守菜市场的逻辑，只好作退市处理。这时候，管你是学者或者作家，全得脱去“书生气”，充分认识到书本无用，能用的在书外，理论只有和电子秤相结合才能产生效益的道理。

提名和申报，被动与主动，诺贝尔奖和我们评奖的差别当然不止这么一点。但是先从这一点改，走出一小步，就可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步。

主编：钟华　编辑：温才妃
Tel:(010)82614599 E-mail:daxue@stimes.cn